



当代英美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研究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Feminist Genre Fict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

梅 丽◎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英语学科‘211工程’三期重点
项目编号: 211YYML001

当代英美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研究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Feminist Genre Fict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

梅 丽◎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美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研究/梅丽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309-09724-5

I. 当… II. 梅…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②小说研究-美国
IV. ①I516.074②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3837 号

当代英美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研究

梅 丽 著

责任编辑/曹珍芬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40 千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724-5/I · 761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Feminist Genre Fiction)是当代英美文学界中最具革新精神也最有趣的领域之一——它是通俗文学作品的女性主义版本,包括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和童话故事等,是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英美国家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当时女性主义小说出现了探索通俗类型小说的分支,通过对传统类型小说进行挪用和戏仿,引发了具有自我觉醒风格和反叛意识的女性主义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的浪潮。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家有意识地从女性的角度开展写作,不再遵循传统类型小说保守的意识形态和老套的故事情节,着重塑造与占西方社会主导地位的父权意识直接冲突的意识形态。她们借用类型小说所具有的大众性躯壳,采用创新性的写作手法传播女性主义思想,为传统类型小说注入了发展性和反叛性,成为“非常适合女性主义的一种政治策略”^①。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得以大规模兴起的源头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英美等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妇女解放浪潮。在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英美的女性主义文学最初套用现实主义的“苏醒”(coming to consciousness)小说模式,是女性主义倡导者呼吁女性觉醒的女性成长小说。艾瑞卡·琼(Erica Jong)的《怕飞》(*Fear of Flying*, 1973)和玛丽琳·弗伦奇(Marilyn French)的《女人的房间》(*The Woman's Room*, 1977)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到了20世

① Anne Cranny-Francis, *Feminist Fiction: 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 3.

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大规模向各类文学形式渗透,女性主义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等对传统的通俗类型小说进行颠覆性和创新性的改写,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许多出版社相继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系列。例如: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Simon and Schuster Press)在1980年代出版了女性主义爱情小说“剪影”(Silhouette)系列。水中仙女出版社(Naiad Press)、潘多拉出版社(Pandora Press)、西芭出版社(Sheba Press)推出了众多女性侦探小说系列。女性主义科幻小说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厄秀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人都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品。而女性主义童话作家们既重写经典童话,又创作新的童话故事,以此来挑战父权意识。1991年,由英国著名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主编的《女英雄童话故事》(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的合订本由女英雄出版社(Virago Press)出版。

对于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性质,文学评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具有反叛的意识和创新的写作技法,是女性主义宣扬其政治思想和文化策略的有效手段,但还是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女性类型小说借用的是通俗小说的模式,目的是吸引大众流行文化市场的读者,它所宣扬、迎合的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就无法避免其大众性、模式性、保守性的写作规则。凯瑟琳·格里高利·克莱因(Katherine Gregory Klein)指出,因为所有的通俗小说类型都具有保守性,女性主义者试图挪用它们的努力必将失败,“近期女性主义小说中出现的变化只是表面的风格、布局以及惯例的变化”^①。大卫·马格利思(David Margolies)在研究女性爱情

① Kathleen Gregory Klein, *Silk Stalkings: When Women Write of Murder*, Berkeley: Black Lizard, 1988, p. 223.

小说后也得出结论,认为类型小说具有内在的父权模式,并从文化层面上分析了女性读者阅读爱情类型小说的原因,指出这一保守的模式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稳固地位^①。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女性主义小说家挪用类型小说的目的?如何看待女性主义类型小说与传统类型小说的关系?如何考察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实际效果?本书试图通过梳理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渊源以及历史上对类型小说的理论批判,探讨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实质、特点与发展状况,并以当代英美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类型小说为案例,分析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爱情小说、童话故事和侦探小说所运用的写作策略,剖析其中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论证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所具有的创新性、颠覆性和政治实践性。

本书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成果。作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搜集了大量与本研究相关的参考资料,并与该校“性别研究中心”成员就女性主义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有益的讨论。书中的部分研究内容,已经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期刊上发表,本书收入上述内容时略有修改。书中首次出现的重要人物、书籍、文章以及地名均注明了英文原文。

希望本书能为类型小说的爱好者们打开一扇了解英美文学新发展的窗户,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和同行们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书中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正。

作者谨识

2012 年 12 月 6 日

^① David Margolies, “Mills and Boon: Guilt without Sex”, *Red Letters*, 14 (Winter), 1988, p. 5.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论女性主义对类型小说的挪用	1
第一节 女性与类型小说的历史	2
第二节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	4
第三节 潜在的可变性	7
第四节 类型小说与意识形态	10
第五节 读者的主体地位	13
第二章 类型小说的界定和功能	17
第一节 类型小说的界定	17
第二节 对类型小说的传统评价与再思考	21
第三节 英美类型小说研究现状	34
第三章 对类型小说的理论批判	38
第一节 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理论批判	40
第二节 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性理论批判	49
第三节 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女性主义类型小说	61
第四章 女性主义科幻小说	73
第一节 类型历史	75
第二节 女性主义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与影响	90
第三节 案例分析	109
一、桃花源里的女儿国——性别的对抗	111
二、雌雄同体的复合人格——性别的解构	114
三、两性共存的理想社会——性别的对话	117

第五章 女性主义言情小说	122
第一节 类型历史	124
第二节 女性主义对言情小说的批判与影响	133
第三节 案例分析	154
一、戏仿的批判性	155
二、反叛性的女同性恋言情小说	158
第六章 女性主义童话故事	163
第一节 类型历史	166
第二节 女性主义对童话故事的批判与影响	172
第三节 案例分析	182
一、对正统童话性别范式的挑战	183
二、赋予女性欲望主体地位的童话版本	188
第七章 女性主义侦探小说	196
第一节 类型历史	197
第二节 女性主义对侦探小说的批判与影响	213
第三节 案例分析	227
一、对传统“冷硬派”侦探小说的批判	227
二、从女同性恋业余侦探小说看性别建构的流动性	232
三、性别的逆转与扩展	237
结语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阅读立场	249
参考文献	253

第一章 论女性主义对类型小说的挪用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是一种承载着传统形式与新型思想的文化斡旋的写作机制,是文学形式与社会观念两者合二为一的体现。女性主义类型小说不仅是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而具有历史价值,它更是复杂的女权主体和女权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女性文学传统本身的建构和发展,以及对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本质是女性主义主体意识的建构,这是一种与传统陈习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其理论前提是审视和批判父权制度所带来的矛盾和不公平。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这个阵地是在小说的传统空间(以传统的叙事和写作手法为特征)内外。女权主义作家一直不断地跨越边界,这些形式上的、美学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旧有边界曾规约、限制了类型小说的写作,而女性主义小说不断地越界,一则力图验证边界的真实存在,同时也为开放、跨越这些边界做出大胆的想象和实践,从而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这场抗辩和批判不仅是文学试验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关于社会变革的思考精华。正是因为如此,与传统类型小说相比,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类型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本质获得了全新的内涵,并具有当代文化的复杂性、微妙性、发展性和开放性,完成了其价值取向与文学形态的双重建设。

本章从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历史发展、政治背景、可变性、意识形态、读者的主体地位等几个重要方面,阐述女性主义对类型小说挪用的目的、成效以及意义。

第一节 女性与类型小说的历史

从历史上来看,包括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在内的类型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保守、肤浅的,而且没有深度、缺乏思想性。评论家将类型小说的广大读者评判为模式化艺术的低级消费者,而那些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类型小说的地位就更低下了。正如特里·洛威尔(Terry Lovell)在《消费小说》(*Consuming Fiction*)一书中指出,即便是类型小说的评论家也对主要阅读对象为女性的类型小说颇有鄙夷之情^①。玛格丽特·戴泽尔(Margaret Dalziel)对19世纪类型小说开展研究后认为,女性和男性阅读的小说具有不同的价值,而后者价值更高^②。

19世纪的主流文学和文学评论家的性别歧视倾向十分明显,女性解放主义者经常遭受到恶毒的抨击。这些女性,或“新女性”,被形容成一群无性的、性欲冷淡的或性欲过剩的怪物。有趣的是,当时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新女性与19世纪末颓废堕落、带有女人气的花花公子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可能导致中产阶级社会灭亡的原因。在当时的批评者看来,两者的联系在于他们都不具备养育孩子的能力,后者因其偏女性化的性取向,而前者则是因其自身缺乏女性特征。评论家们用“意识形态生物学”的观点对“新女性”进行攻击(所谓“意识形态生物学”,是指用生物学术语来解释实则由意识形态规定的两性的社会角色,例如女人不够强壮,所以不能干男人的活;或者从生物学上来看,女人天生就不如男人聪明),这种言论直到1894年还在《笨拙周报》(*Punch*)上出现^③。实际上,无论是女性化的花花公子还是“新女性”,都打乱了主导当时社会的父权意识形态,尤其

① Terry Lovell, *Consuming Fiction*, London: Verso, 1987, p. 1.

② Margaret Dalziel, *Popular Fiction 100 Years Ago*, London: Cohen and West, 1957, p. 1.

③ Linda Dowling, "The Decadent and the New Woman in the 1890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33 (1979), pp. 434-453.

对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能力和前途的刻板界定提出了挑战。由于中产阶级女性在整个 19 世纪中对社会平等的诉求愈发强大,代表父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办法就是,将凡是大众的、叛逆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让(男性)中产阶级感到恐惧的社会群体及其意识形态,都一概定义为女性的、低劣的。安德里亚·胡森(Andrea Huyssen)指出: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在 19 世纪站住脚的观点,即大众文化和女性相关,而真正的高雅文化仍然是男人的专享……实际上,我观察到即使在世纪之交,政治、心理和美学理论仍始终坚持把大众文化和大众定义为女性的,而高雅文化,无论是传统或现代的,明显还是男性活动的专有领域,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①

从这一历史角度来看,类型小说的女性主义版本的诞生便有了一种美妙的讽刺性。在政治、心理、美学、文化话语制度等方面都被父权意识认为是女性化的、低等的类型小说,却被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利用和改变。女权主义作家非但不排斥大众文化,相反拥抱大众文化,充分发挥大众文化的传播优势,出版大量的类型小说,将传统类型小说流行化、大众化的文化属性转化为宣扬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传播工具。如果从传统陈习的文学观念去看,人们会贬低女性作家的地位,嘲讽她们为大众文化的制造者,而女性作家正是要利用这一点来展现她们为自己的天赋和权利正名的过程。她们正是要运用类型小说这种形式,来揭露父权意识的话语结构,以形式的挪用、以近似于讽刺和解构的方式来挖掘父权社会的话语制度,从而达到调侃、挑战和批判的目的。当然,从文学形态和叙事方式的角度来看,类型小说与女性的阅读经验和思维特点、写作方式有着先天的亲

^① Andreas Huyssen,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7.

和力,女性作家运用的正是这种她们长久以来都稔熟而擅长的文学形式;而她们现代的写作手法则得益于196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物质改善和伴随而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

女性主义作家选择挪用类型小说这一形式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女性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广泛影响,类型小说这种被传统文学批评所排斥,特别是被左翼文学贬低为大众化、保守化的文学形式,开始被女性主义者重视和运用。

在文学批评传统中,关于大众文化批评所采用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它告诉我们,大众是完全没有个体自由意识与反抗可能性的被动群众。他们对通俗文化的冲击没有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和批判性,因而这种文化在政治上进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坚持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出于机械复制的目的,文化工业呈现出一致性的特征:“这种经济需要阻止了对每件艺术作品的内在逻辑的追求。”^①阿多诺更是在文化自律与大众文化之间划上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这些理论的主导下,类型小说长期以来被界定在“经典”、“严肃”的文学之外。

但是,随着1960年代以来社会环境和学术兴趣的转变,在以多元、流动、去中心为要旨的后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大众更适合于被理解成一个不断变化并以多种方式交互共生的、适应或抵制主导价值的不同社会群体的集合。这个集合既不是没有分辨能力的被动者,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在文化上的反抗力量。因为反抗实际上是存在于紧张和对抗的社会形态之中,而当代大众文化集合实际上是存在

^①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2, p. 288.

于一个跨越区间、国界的流动性、衍生性的圈层之中,存在于其生产与再生产、制造与消费的过程中,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存在于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静止的论文文本之中。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新的时代含义,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左翼”开始接纳通俗文化。朱迪·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在1980年代的“左翼”期刊《新社会党人》(*New Socialist*)中指出:“过去对‘左派’来说,宣称对迪斯科舞或其他任何通俗文化的喜爱是一种大胆冒险的行为。现在似乎要求以同样大胆的行为来表明,这样使人尽兴的活动并不是激进的。”^①在1986年《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举办的“活力左翼”(Left Alive)会议上,发言者不乏顶级设计师、潮流作家和电视广告商。

女性主义思想家在这一变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1980年的一个访谈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认为:“女性主义者试图影响大众传媒,以获得更广泛的拥护。”她反对精英主义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保守的逃避主义的看法,并提出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努力创造女性语言,二是女性主义者朝通俗文化进军。“……相对而言,一个大范围内的小变化,与一个小范围内的大变化有同样重大的意义。电视肥皂剧带来变化的可能性至少和政治教育剧带来变化的可能性一样大。”^②

可以看出,进入通俗文化和小说领域是20世纪80年代左翼女性主义者的日程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扭转“右翼”控制通俗文化的局面(如“右翼”创造了“雅皮士”等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有发表通俗观点、改变文化观点的需要,而尝试挪用通俗文化和通俗作品类型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如安妮·克

① Judith Williamson, “The Problems of Being Popular”, *New Socialist*, 41, September 1986, p. 15.

② Michèle Barrett, “Feminism and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Politics”, *Femin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Rosalind Brunt and Caroline Rowan (ed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2, p. 55.

兰尼-弗兰西斯(Anne Cranny-Francis)在《女性主义小说:女性主义者对通俗小说的应用》(*Feminist Fiction: 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中所总结的那样:“女性主义为什么要选择类型小说为操作对象的原因,和人们形容这类小说的词汇有关——大众化。”^①人们爱读通俗小说;其销量也极为可观。对一名女权主义宣传者来说,运用一种已占有巨大市场的小说形式是明智而有效的行为。美国女性出版社(Women's Press)出版的科幻小说系列在其首页上印上了该出版社的宣言,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目的。其宣言的部分内容如下:“我们希望本系列能鼓励更多的女性阅读和写作科幻小说,使科幻小说的传统读者群拥有刺激而全新的阅读视角。”^②这一宣言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承认了一个值得开发挖掘的既有读者群的存在。该读者群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背景多元。因此,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以女性主义的方式运用通俗小说就显得十分恰当了。这种方法(潜在地)使得女性主义作者能够进入原本向她们关闭的大门。女性主义可能在许多读者眼里非常陌生,但通过类型小说这样一种人们熟知的和受人喜爱的形式表现出来之后,就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产生的结果就如同美国女性出版社希望的那样,无论是在阅读内容或阅读习惯方面,女性主义都为传统的读者群提供了一种刺激且全新的阅读视角。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自1960年代至1980年代早期,英、美流行文化的兴盛也为女性类型小说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潮流背景,同时期的摇滚、波普艺术成为空前强大的大众流行文化,尤其是波普艺术以其明确的大众趣味挑战传统精英文化,以去深度化的话语方式解构和挪用经典作品,让文化先锋们在自“二战”以来长久压抑而缺乏兴奋感的时代背景中找到了新的兴奋触点。因此,女性主义类型小说

① Anne Cranny-Francis, *Feminist Fiction: 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 2.

② Ibid.

之所以能把前卫、实验的写作观念与看似去深度化的话语方式相结合,这其实是先锋文化突破传统话语制度、寻找新的话语方式、重构价值体系的共同策略。

当我们把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放入当代文化发展背景中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它已经超越了作为文化形态的传统定义,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权利结构、话语制度的文化创造和表达的新方式——以灵活开放的方式改造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单一通道,从而致力于解放、平等和多元的当代文化和当代政治命题。因此,我们在新女性借助传统类型小说而创作的新类型小说的案例上,可以看到类型小说的文化性格、价值趣味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一,传统类型小说逐渐成为女性主义文化族群谋求新的文化身份和建立新的价值认定的手段;第二,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正逐渐成为这些新生族群改变传统父权社会话语方式、话语制度的有效的途径;第三,女性主义类型小说进入宏观的当代文化艺术市场,以一种强力传播利用了大众的阅读趣味,侵袭和干预了传统文化生态,改变了单一的父权文化的生态格局,从而对未来文化产生了影响,至少是想象性地开辟出了新的文化生存空间。

第三节 潜在的可变性

从女性主义类型小说具有的反抗性和革新性来看,它已经远远脱离了类型小说的传统定义,但是它依然沿用了类型小说的外壳,在此基础上进行挪用或戏仿。对此,有评论家认为,女性主义类型小说作家虽然在作品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但在本质上无法脱离传统类型小说的写作模式和主导意识,因此难逃传统类型小说的藩篱。那么,如何看待和理解类型小说的性质,就是探讨这一争论的关键因素。

根据小说界的惯常定义,“类型”(genre)一词是指那些有一套固定模式或传统风格的作品,例如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或爱情小说等这

些类型。“类型”一词的使用在文学评论界和出版界是十分普遍的,书商也往往会在书的封面上标明作品分类。然而,在探讨女性主义类型小说这一特定文化现象时,“类型”的使用超越了这种简单分类。研究女性主义者对通俗文学形式的运用,表明类型不仅是一种文学或语言学分类,还是一种社会实践。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中探讨了小说类型这一概念的有用性,以此作为理解社会符号学的一个例子:“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类型这一概念的战略价值显然为其斡旋功能,它从形式的演变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两个历史角度,调整着对作品固有的形式分析。”^①

这段话对女性主义来说也同样适用。女性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一直都在进行这一复杂的步骤:将个体的小说放置于那一类型的历史长河中,找出传统写作手法中重要的意识形态,将它们与其包含的意识形态主义联合在一起,再分别根据社会中的主流和被边缘化的声音对这些主义进行审视和批判。

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 K. Halliday)等人将社会环境和小说类型之间的关系作了概念化的界定,为研究文学(子)类型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小说类型是对特定社会情况的回应,而作家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他/她是否能针对不同的情况选取相应的小说类型。这种能力取决于作者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取决于他/她能获得多少父权社会的强势信息并将之植入类型小说之中^②。

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正是通过选择不同的小说类型,从多个层面揭示小说类型何以成为一种社会策略。需要肯定的是,类型小说的写作无法脱离传统。传统是社会概念,是社会意愿,而非个人选择,但同时,传统本身也处于各种社会压力之下和各种力量斡旋之中。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London: Methuen, 1981, p. 105.

② M. K. Halliday and Ruqaiya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Geelong,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

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得之前广为接受的传统会变得难以让人接受,需要修正。例如,当代侦探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女侦探。这种情况只有在西方社会中职业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后才能被人接受。正如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对巴赫金(Bakhtin)作品的研究中阐述的那样:“小说类型是形式上的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学概念。因此,在考虑小说类型的变化时必须考虑社会转型的因素。”^①而社会转型的原因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特定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重组。女性主义类型小说是对这一重组过程的干预,试图通过挑战父权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符号学系统,达到推翻父权统治地位的目标。

对于类型小说的可变性和流动性,詹明信也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类型具有可变性,具体的例子体现为中世纪爱情小说中的“魔力因素”,在18世纪得到再创造,被替换为“神学和心理学因素”。尽管小说的基本形式保持相同,但因为新的历史背景,小说的本质和精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詹明信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类型是可变的,但类型的形式就像是沉积物一样,不断地承载着一些早期的意识形态: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这种构建,我们把它叫做形式的沉积……在现有的强大的形式下,一种类型本质上是一种象征社会的信息,或者说,那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意识形态。当这样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被重新挪用,这一信息继续存在并一定会在功能上被纳入这种新的形式……就这样形式本身的意识形态沉积下来,并作为通用的信息与以后的元素在一个更复杂的结构中共存。这是一种或矛

① Tzvetan Todorov,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Wlad Godzich (t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0.